

YIN QING YU XUE DANFUDAN

陰 晴 雨 雪 旦 復 旦

——历史，你听我叙说

主编/张大芝 毛微昭 吴明先



珍藏版

香港華泰出版社

I251
97

阴晴雨雪旦复旦

赠阅



I251

97

香港華泰出版社



SEU 06657446

阴晴雨雪旦复旦

封面题字：陈宝泰

策 划：王欣荣

主 编：张大芝 毛微昭 吴明先

出 版：香港華泰出版社

(香港柴灣祥利街 18 號祥達中心三/F305 室)

发 行：香港《名人世界》雜誌社

国际书号 ISBN: 962 - 8482 - 47 - 5

开本：787×1050 1/16 印张：28.5 字数：448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價：港幣 48 圓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这是一本复旦大学新闻系五五级部分老同学写的回忆录。它是我们年级为筹备在 2005 年母校百年华诞和我们入学 50 周年时的同学聚会而创办的一个联系沟通平台《六 0 通讯》(内刊)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当时一些同学的回忆文章陆续在通讯刊登以后,引起了许多老同学的热烈反响。当通讯准备停刊以后,有同学就提出选择一些文章集结成书的倡议。经过大家反复酝酿,最后确定以忠于历史、忠于事实为原则,通过五年大学生生活和毕业以来的个人种种遭遇的回忆,来叙述大家所经历过的风雨历程。

我们都是曾立志要从事新闻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光辉灿烂的新中国,为了新中国的新闻事业,我们考入了复旦新闻系。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鼓舞下,我们曾有过两年大学生活的美好记忆。而在 1957 年的复旦校园上,却突然发生了暴风骤雨。当时我们新闻系学生几乎都是“最听党的话”的,只有几位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过一个叫“春柳社”的文学社团,出了两期《给爱花者》墙报,在校内激起过一点小小的涟漪。它并没有触及政治,却立即受到了讨伐;另外加上有的同学在校刊上发表的文艺作品受到曲解,有的因受人诬陷,结果共有六位同学被打成“右派”(正好是 5%),受到严惩;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又因为支持过《给爱花者》,也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

我们新闻系的师生并没有在整风中向党提过什么意见。但是,我们的系主任王中教授在 1956 年的新闻改革中对新闻基本原理进行了勇敢的探索,提出了报纸的“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党报的两重性”等著名观点,为新闻事业改革提供了一种选择,在新闻界中得到许多人的赞同,被誉为“新闻改革理论家”。但他的观点在 57 年却被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家”,钦定为“右派”。我们系的一些青年教师和高年级同学起来为他辩护,主持正义,认为是学术问题,应允许讨论;也不幸因此纷纷中箭落马。在此后的三年中,我们基本上被取消了大学的正规教育,从下乡下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除四害、大炼钢铁、公社化、大食堂、大跃进……我们经历了最密集、最频繁、最漫长和最激

烈的思想政治运动。虽然我们是那么虔诚，向党交心，自觉改造，但到1960年毕业时却又在极左思想主导下给很多人罗织种种恶名，在鉴定里写进诸如与党“离心离德、三心二意”的字样，有的还在档案里装进“小条子”，致使许多同学毕业后受到整肃：有的劳教劳改；有的发配新疆青海、云贵甘川；许多同学不得不改行到偏僻小县从事与专业不相关的工作，终身不受信用。此后“社教四清”还没有搞完就来了“文革”，更加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使许多同学被批判、斗争、游街、示众，关牛棚、拘留、逮捕、直至判刑，遭受从肉体的摧残到精神的折磨，历经坎坷！

但是，他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那颗心却始终未变。拨乱反正以后，这些受到伤害的同学都先后得到平反和改正，有的成为工作、业务或学术上的骨干，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自己不愧是人民的儿子。我们这个年级的历史是我国“大历史”的一部分，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历史的一个缩影。我们的历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真切地揭示出当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生动地展现出当代历史的真实面貌。许多人的经历读来令人匪夷所思，不胜唏嘘。

我们的青年时代，都以生长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自豪、而欢欣。几曾何时，回首人生，又有多少同窗不由得感到“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一千多年前王勃这段脍炙人口的名句，我们朗读、背诵，其实并没有真正读懂它的深切含义，而今看看我们年级许多同学的命运，岂非正是他们人生的真实写照？

我们如今都已经是古稀老人，许多老师和同学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书中的许多文章表现了在那个天天不忘阶级斗争，制造人为对立的岁月里，同学间的真挚感情和对逝者的深深怀念。在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没有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我们亲历的一切今天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既曾是新闻专业的毕业生，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亲历，以保存原始的真实的记忆，是完全能够做和应该做的。我们要把长期被人们有意歪曲的历史通过自己的回忆去纠正过来和充实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故事。我们都知道巴金生前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他说：“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又说：“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我们这里记下的不仅是“文革”中的事情，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半个世纪里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就是我们编辑本书的动机和目的。

《阴晴雨雪旦复旦》编辑组

2008年1月17日

目 录

(一) 前言

(二) 目录

第一辑 复旦岁月

- 1、复旦五年读书记【编者】 (1)
- 2、1955—1960
 - 五年制本科第一届（丁淦林） (3)
- 3、绿铃的召唤（丁锡满） (5)
- 4、欣遇名师复旦园（毛微昭等） (7)
- 5、《文汇》试笔
 - 记邵嘉陵老师（吴明先） (15)
- 6、弦歌之忆（王欣荣） (17)
- 7、我当过复旦口琴队队长（柏志成） (22)
- 8、大学生生活点滴
 - 致费修竹同学信（黄麟玉） (24)
- 9、《给爱花者》纪实（姚福中） (26)
- 10、回忆《给爱花者》（费修竹） (28)
- 11、早春二月一小花（周昭先） (30)
- 12、附：林仁欧 1957 年画【素描图】 (33)
- 13、我们也曾参与造神
 - 编纂《各族人民歌唱毛主席》歌曲集的故事（周鸿度） (34)
- 14、罗店枯草（夏启良） (36)
- 15、难忘罗店（费修竹） (39)
- 16、怀念孟老（毛微昭） (43)

- 17、在上钢五厂的日子里（肖宜） (45)
- 18、上钢五厂琐忆（彭建安） (47)

第二辑 难忘名师

- 21、王中生平简介【编者】 (51)
- 23、安岗、杨西光关于王中同志右派问题致中组部的函 (52)
- 22、先知者王中（吴明先） (54)
- 24、王中对新闻理论的探索（徐培汀） (56)
- 26、怀念我的父亲（王进军） (65)
- 25、愧对前辈
——忆王中（杜荣进） (67)
- 27、半个世纪前的日记（毛微昭） (72)
- 28、怀念王中教授（张大芝） (76)
- 29、亲聆王中老师的教诲（姚福申） (81)
- 30、小事不该上纲
——罗店劳动忆王中（陈鑫根） (84)
- 31、重沐清风忆王中（宁范惠） (86)
- 32、难忘的几件小事
——忆王中老师（朱家生） (89)
- 33、永远是一个中国人
——记赵敏恒教授（邵嘉陵） (91)
- 34、赵先生被捕那一天（周仁寿） (98)
- 35、劫后重生的舒宗侨（邵嘉陵） (99)
- 36、我所知道的蒋孔阳老师（彭建安） (103)
- 37、最难忘的幸福一天（朱振华遗稿）【肖宜：附记】 (106)

第三辑 人生际遇

- 38、人生际遇简介【编者】 (111)
- 39、无悔（韩修鲁） (112)
- 40、一封朝奏九重天（刘作根）

【附：一封给毛主席的信】	(114)
41、难以忘却的往事	
——生活片断追忆（杨鞠卿）	(121)
42、漏船载酒泛中流（韩寅）	(130)
43、亲历饥馑（赵昌春）	(133)
44、初至河南（夏启良）	(140)
44、我在新疆军分社（徐福达）	(149)
45、尘封的往事（王绿萍）	(152)
46、不圆的句号（刘作根）	(162)
47、金粟十斤忆当年（彭建安）	(166)
48、吃猪潲的“香味”（韩寅）	(169)
49、艰难岁月拾忆（何永昌）	(173)
50、历史无奈的叹息（李鸿斌）	(176)
51、我的牢狱之灾（章文圭）	(179)
52、领队严源先生（徐成森）	(187)
53、集中改造杂记（周仁寿）	(190)
54、握手周仁寿（许学东）	(192)
54、以史为鉴话当年	
——“右派”经历点滴（居思基）	(194)
55、我在美国打工（何永昌）	(200)
56、柴达木啊柴达木（毛微昭）	(205)
57、匪夷所思二十年（张大芝）	(240)
58、世事茫茫难自料（节选）（姚福申）	(277)
59、在时代的风潮中	
——我和媒体老将赵超构（张循）	(319)
60、“小条子”的流毒（韩寅）	(329)
61、两谈忏悔与宽容（居思基）	(332)
62、读《历史无奈的叹息》有感（王道华）	(337)

第四辑 同窗情深

63、友谊之树常青	
——代本辑介绍（彭正普）	(339)

19、细细端详你是谁	
——记毕业后的第一次重聚（刘末利）	(341)
20、五十年一聚会	
——复旦百年校庆时的第二次聚会（刘末利）	(345)
63、飞渡重洋来相会（邵西苓）	(349)
64、微山湖畔访老韩（彭建安）	(351)
65、人到无求品自高（王玉芬）	(355)
66、热情依旧	
——我从思基身上看到什么（吴明先）	(357)
67、往事犹在昨日	
——我说姚福申同学（费修竹）	(359)
67、心灵的沟通：致张大芝（赵昌春）	(362)
68、致赵昌春（张大芝）	(363)
69、我的亲密同学单承芳（刘末利）	(366)
70、茶香悠悠话绿萍（王玉芬）	(369)
71、感子故意长（王玉芬）	(372)
72、同窗相见泪盈眶（吴明先）	(374)
73、往事犹在昨日（费修竹）	(376)
74、点击与倡议（王欣荣）	(379)

第五辑 怀念逝者

75、怀念逝者【编者】	(383)
76、校庆时节忆故人（张大芝）	(384)
77、读故人旧信琐记（费修竹）	(389)
78、元恺长眠赣水边（韩寅）	(391)
79、忆“范老”（费修竹）	(400)
79、一曲悲怆的交响乐	
——怀念卢景文（彭建安）	(405)
80、陈兵同学（吴明先）	(408)
81、心中的王捷（刘末利）	(411)
82、定国走了（居思基）	(414)
83、怀念黄成文兄（韩寅）	(415)

84、附黄成文遗信：致韩寅（二封）	(416)
85、追思黄成文（徐成森）	(421)
86、陈胜天的“两个”家庭地址（金万化）	(423)
87、风雨同舟悼同窗 ——悼裘惠民（周鸿度、毛微昭、李海风等）	(425)
88、悼吴珏（张大芝）	(427)
89、附吴珏遗文：哦，星条旗	(429)
90、正仪兄 你在哪里（王中义）	(433)
91、后记（编者）	(435)

复旦五年读书记

编者

本届同学是1955年秋季经全国统考,被择优录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共有117人。这个年级是复旦本科五年制的首届生,到1960夏天毕业时,共有107名毕业生,号称“108将”。

本届同学入学后,在全国著名学者和政治家陈望道校长、著名新闻教育家王中教授等的指导下,意气风发,情绪高昂,根据新的教学大纲很快投入文、史、哲基础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特别在进入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后,同学们劲头十足地、全面地展开了学习竞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并在体育、文娱、宣传等方面成为全校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这一时期是同学们收获最大、最为激动、最堪回忆的大学生活。

1957年夏天,突然的暴风骤雨席卷全国,也笼罩着复旦大学的美丽校园。虽然这届同学还继续正常地学习了一个学年,但也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不仅以系主任王中为首的许多教师被打成“右派”,本年级也有六位同学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恰占5%),受到严重处分。这次反右斗争对于参与其中的本届同学来说,不仅刻骨铭心,也干扰了专业学习,还在同学们在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以前那种生气勃勃的学习局面、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

1958年,全国大跃进开始。本届同学间接地参与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放卫星、除“四害”等运动。是年秋,全年级下放宝山县罗店镇跃进人民公社劳动锻炼,1959年2月起至59年10月底止在新闻单位实习,后回校继续学习,直到1960年夏天毕业。这一段前后整整两年多,基本上没有进行系统的正规专业学习,这最后大学两年所给予同学们留下来的回忆是复杂的、矛盾的、有些甚至是无可言状的、痛苦的。然后就黯然四散,恰恰又碰到“三年困难时期”,除了小部分同学的工作和生活比较顺利外,许多同学因毕业鉴定和档案中的“小条子”问题被迫脱离了所学专业,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

境中苦苦挣扎。接着又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少同学又受到冲击，同学之间音信断绝，绝少消息，直到“四人帮”垮台。1978年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国策，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很快使国家的面貌大变，不少同学又重回新闻专业岗位，努力追回失去的光阴。因之，无论从事专业的还是改行了的，绝大多数同学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逆境顺境，都充分表现出了我们复旦新闻系友的很高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今天，老同学们大都已经退休养老，安度晚年，终于有可能重温旧梦，回忆漫漫的过去，有酸、有甜、有苦、有辣；庆幸自己活着迎来了“和谐社会”；瞻望未来，坚信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在眼前！

1955—1960

五年制本科第一届

丁淦林

我国大学新闻系本科,现在都是四年制。而复旦新闻系,一度实行过五年制。1955年秋季入学、1960年毕业的六〇届,就是五年制第一届。在当时,实行五年制是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表征之一。

这里说的发展,是在中国新闻教育度过几乎没顶之灾以后出现的。1952年,中国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院系大调整,将高校的体制与结构,从解放前英美式的改组为苏联式的,一些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学术的系科,如心理系、社会系,停办了。原来由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组成的复旦大学,改组成文理系科组成的综合大学。至于新闻系,著名的燕京大学新闻系,随着燕大并入北京大学;但没有独立成系,而只是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中设置编辑专业(数年后才改称为新闻专业)。在上海,有人主张复旦新闻系停办。陈望道校长知道后,十分着急,迅速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高等教育部反映意见,要求让复旦新闻系继续办下去。据说,此事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说:复旦新闻系是陈望道的事业,要听他的意见。后来又汇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毛主席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吧。就这样,复旦新闻系避免了遭封杀之灾,继续开办,成为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

主张新闻系停办,是教条主义学苏联的表现。苏联的新闻干部,是由苏共党校培训的。这大概是因为新闻干部是党的宣传干部,新闻系的政治性强,要由党委直接抓。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当时没有新闻系,只有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设置新闻专业(1953年才独立建系)。其实,我国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新闻事业也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需要大量补充新人员,新闻系不

仅不能停办,而且需要发展。1954年,国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新闻干部的需要更为明显。同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中提出:“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陆定一在说明这个决议草案时指出:“现在我们只有两个学校有新闻系科,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有个新闻系,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文学系里面有一个编辑专业。每年招生招得很少,今年准备给他们增加招生名额,两校共增加一百名”。复旦新闻系1953年仅招生三十多名,1954年即扩大至109名。1955年招生117名,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同时,从1955年开始,复旦新闻系本科实行五年制。

新闻系本科实行五年制,是苏联的办法,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就是五年制。六〇届同学——作为复旦新闻系五年制本科的首届学生,是在学苏联的热潮中进校的。《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在校园飘荡。复旦新闻系本科生的培养目标,也按苏联提法规定为:“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课堂教学被视为最重要的环节,教室里带写字板的椅子不见了,换上了整齐的桌椅,固定座位,上课时要求学生面向老师,目不斜视。但是,索然无味的苏联教材和“五性一统”的说教(党性、战斗性、思想性、群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引不起同学的兴趣,甚至使人厌倦、反感。于是,王中教授在1956年上半年开讲的《新闻学原理》,内容切合实际,论证清晰,举例生动,很受同学的欢迎。

正当“独立思考”的口号为大家所接受的时候,孰料一场“反右派”的急风暴雨骤然而至,一些思想活跃的师生被打成了另类。接着,下乡下厂,“反右倾、鼓干劲”,够折腾了。到1960年毕业时,国家遇上了困难时期,同学们就业维艰,黯然四散。只有同窗的感情,永远把大家连结在一起。

复旦新闻系本科五年制,一直实行到1965年(七〇届),共计十一年之久。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全国高校所有系科一样,复旦新闻系停止招生了。1970年至1976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为三年。1977年恢复招收本科生,学制为四年。但是,五年制毕业生就业后的工资待遇同四年制毕业生一样。同样是1955年入学的,四年制的于1959年毕业,称为“五十年代毕业生”,而五年制的于1960年毕业就成了“六十年代的毕业生”了。多读一年,反而吃亏,已是不用争辩的事实。

绿铃的召唤

丁锡满

“的铃铃铃……”，那绿色的电铃从路边的电线杆上响起来了，从大楼的走廊里响起来了。那是上课的铃声。它催促同学们加快脚步，走进登辉堂、走进1200号梯形课堂、走进那一排排毛竹搭成的教室，去聆听陈望道校长、王中系主任、鲍正鹄、张世禄教授给我们上课。“的铃铃铃……”，绿色的电铃又响起来了，那是下课的信号。同学们从教室里鱼贯而出，走向阅览室，走向宿舍，走向操场……。那是多么好听的铃声呀。我们在这悦耳的铃声中吮吸着知识的源泉，我们在这快乐的铃声中度过同窗的生活。

多么亲切的铃声、多么甜蜜的铃声呀。“醉别西楼醒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我们已经四五十年没有听到这样的铃声了。昔日的同学少年，今日已白发衰颜，垂垂老矣。“悲欢离合一壶酒，南北东西万里程。”我们的同学，有的远在贵州，有的远在新疆，还有的更远在美国、澳洲，甚至天人永隔。虽然如此，但是50年前的故人故事，还仿佛如同昨日。王作民同学那扣叮烟斗的长者风度，王明老山东那轰轰烈烈的炮筒子性格，汤之盘那尖尖瘦瘦的下巴，徐成森那温文尔雅的气质，还是常常浮现在眼前心际。

从1955年9月第一次踏进复旦大学校园，至今50年了。5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们经历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呀。那时我们第10宿舍2号楼的旁边还是农田，我们的部分教室还是竹棚，我在下雨天的时候要把破布鞋挟在腋下，打着赤脚，手端一个墨水瓶，瓶中插着一枝铁皮笔尖嵌在竹竿上的蘸水笔走进教室。全靠每月16元甲等助学金度过3年艰苦岁月。16元中，除了12元伙食费，还有4元要买课本、讲义、肥皂、草纸。因此，从这4元中节省下来买过的惟一的一次零食5分钱的吐司面包片，便是我永久的记忆。1957年，我平生买的第一本书《唐诗三百首》，虽然现今已发黄发脆，霉斑点点，但是我还是珍藏不弃。现在不同了，复旦校区简直像一个县城，不但邯郸路两旁新楼拔地、高屋摩天，还把新校区造到了江湾；我也早已步入小康生活，绝无衣食住行之忧了。校门前那叮叮咚咚的有轨电车早已绝迹，国权

路、五角场那屋檐低矮的小店早已变成现代化的商场。上海的市区和郊县除崇明以外的18个区县已经连成一片,几乎已看不到农田。外国客商、中国客商争买着上海的房屋,把上海的房价抬到了半天高。

1955年,2005年,我们走过了50年。50年来大变天。今天是母校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年。百年华诞惊巨变,好叫学子喜泪涟。百年校庆,又是召唤学子的绿铃。于是老学生们又从地球的东南西北,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到一起,走到了母亲的身边。虽然我们自己也已经白发苍苍,到了古稀之年,但是在百岁母亲面前我们仿佛还是幼稚的少年。虽然复旦的面貌已经大变,很难找到记忆中的从前,但是,登辉堂的草地,图书馆的灯光,2号楼的宿舍,1200号的课堂,老师们讲课的的姿态,同学们各自的脾气,5年共同生活的回味,别后悠悠思念的情意,仍然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今天我们又团聚在一起,像50年前一年级新生一样沐浴着复旦的阳光,把积累于心的离情别意尽情的释放。这次百年校庆的聚会,使我十分感动,引起许多感想。

人生有情。有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夫妻之情、朋友之情、同事之情、师生之情、同窗之情,这七种情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同窗之情或3年或5年,在七情之中时间不算很长,但是,我们复旦大学新闻系六〇届的同窗情之深,同窗情之厚,同窗情之真,同窗情之切,恐怕不仅在复旦大学,就是在整个社会,也是少有的。这种感情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一是“相见欢”,二是“相思切”。

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经常有聚会。上海的同学托福李晓庚的余温,年年相聚于岳阳路音像资料馆。此外,有时到何公心同学的公司,有时到彭正普同学的府上。广州、杭州的同学也常常利用招待远道而来的同学的机会,大家相聚在一起。这次百年校庆的相聚,大家更为珍惜,特别欢快,因为我们都认识到自己老了,离多聚少,今日相见,不知何日重逢!校庆过后,又要车儿向西,马儿向东!

人生很奇怪,越是到老年,越是会怀旧,越是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感到留意。我们新闻系六〇届的同学这方面感情特别深切。我因早两年离校,工作也比较忙,与大家接触相对较少。但是老同学们对于办《六零通讯》之热心,写文章之积极,文中感情之深厚,都使我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一届老同学的感情,就是亲兄弟、亲姐妹也不过如此。这种感情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值得珍惜的。

百年校庆,半世深情。情深至极,惟我“六零”。于是我借“六零”的谐音,想起那召唤上课的铃声,比作绿铃之颂,以记旧情。

绿铃绿铃,的铃铃铃,的铃铃铃……。

欣遇名师复旦园

毛微昭

自从半个多世纪以前考入复旦以来,我们这一生,就同复旦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尽管我们早已离开了母校,但时常在怀念着复旦的老师。作为一所著名大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她拥有许多名师。至今我们一讲起母校,就会想起母校的老师。

在复旦的五年,我们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我们是 1955 年进复旦的。从 55 年到 57 年,即我们的一、二年级时,每学期都上八九门课,主要是基础课。无论是本系,还是中文、外语、历史等外系的课程,都有名师授课,有的当时是中青年教师,还不是知名度很高的人,但后来,他们大都成了自己领域里的名家。我们常常在报刊上,各种学术刊物上以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他们的活动,他们的成就,总会让我们感到格外亲切和引起我们的关注。复旦的名人之多,名师之多,回想起来,这也许正是“名校”的一个特点吧。

我们想起了许多复旦的老师。

一年级上《现代汉语》课。甲乙两班合上,由胡文淑老师授课,她那时已经是教授,据说她曾在马来西亚当过华人中学校长。她先生是著名哲学家全增嘏教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英文本就是他翻译的,住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一间日本式建筑里。我们曾多次到胡老师家里去请教过问题。我们去胡老师家时,常见到全先生在书房里看书,思考问题。胖胖的上了年纪的胡老师对我们非常亲切,她同我们讲话时常常用尊敬的口吻一口一个“全先生”。她总在客厅里为我们答疑,个子大大的,说话却轻轻的,怕打扰了全先生。教丙丁班是胡裕树老师,那时他还是年轻的讲师,课讲得特别好,分析透彻,条理清楚,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二十几年以后,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上世纪 80 年代全国许多高校的中文系,都曾采用他编写的《现代汉语》教材。